

何妨是書生

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

潘光哲 著

追求自由而有所承担

敢于说不的书生

开创“中央研究院”一段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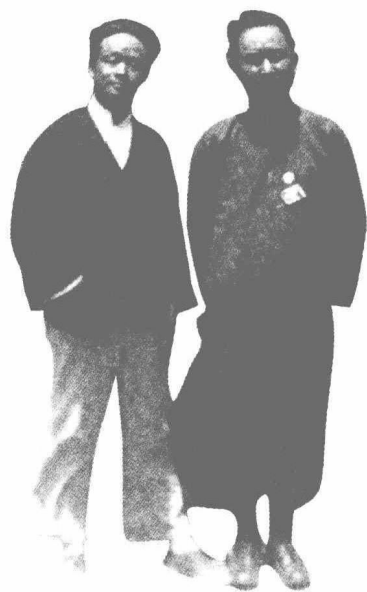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何妨是書生

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

潘光哲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

(温故书坊)

ISBN 978-7-5633-9215-5

I. 何… II. 潘… III. 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6214 号



网络支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泰安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5 字数:140 千字 插图:77 幅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创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屹立至今八十年,仍是华人学术社群里的巍峨殿堂。在20世纪的华人世界里,战乱不绝,纷扰不已,研究院的创设、维系、成长和茁壮,实在是历史的异数。走过八十年岁月的研究院,一路行来,风风雨雨,正也积蕴了无数的逸事篇章,足可启迪后世。这部小书,就是个人在专业学术领域耕耘之外,略施副力,研治书写研究院的历史典故和前辈风范的成果。

当然,史学工作者回首旧轨陈迹,与个人当下的现实关怀,密不可分。这部小书的观照视野,往往难免反映自身生活世界的感触所及。例如,笔者述说傅斯年怎么评鉴吴晗的学术业绩,释论青年周一良如何在学术的世界里自由翱翔,讲述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研究院曾经意欲“进军西北”的故事,其实都是对当前学术生产体制的现实,进行历史的反思,尝试指陈此际学术生产体制的“合理性”,并不见得是“理所当然”。对于研究院的学术领袖和政治事务的千丝万缕,本书也有所勾描。理未易察,善未易明。计较是非对错,做出打圈或打叉的唯一选择,往往只会让复杂多样的历史图像,变得那么单调失真。

对20世纪的华人来说,开创建立现代意义的学术社群,举步维艰,长路迢迢,研究院的历史,正是最好的一页见证;这页历史涉及的重层样态和

丰厚意涵,更是多样难尽。相较于正式的学术研究成果¹,或是比较全面的历史纪实之作²,这部小书,不过只是研究院璀璨历史的吉光片羽,绝对不是对这八十年历史进行全面而成体系的研究。唯则,笔者问学研史致知,总自期能够尽可能逼近历史原来本相,还原历史本来场景。比如胡适怎么在公开场合反驳蒋介石对研究院的“期望”,笔者的叙述,固然参照当时亲历其境的学界耆老的回忆,却总希望能够逼近历史的本来样态,遂乃比较各自回忆述说的出入所在,并与既存的文字记录相对照,庶几或可求实存真。因此,凡是本书涉及的课题,个人总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多方查找史源,进行研究,述说所本,自需立足于先贤研究业绩,或是以个人既有之研究成果为基础³。为免繁琐,本书诸文之史源与立论基础,概列入书末的“征引书目”,以便有心的读者复核查找。至于附录两篇,述说刘广京与张忠栋两位教授的学术与生命历程,既因为他们是恩惠于笔者的业师,遽归道山以后,笔者感怀师恩,自有彰显师道行谊的责任与义务,也因为广京先生是研究院院士,忠栋老师则是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现在的欧美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们的学术业绩都和研究院密切相关,也是中研院院史的多重风采的一页。⁴

1 例如:陈时伟《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1927—1937年》,收入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15辑(商务印书馆,2003),第173—213页。另可参考陈时伟的博士论文:Shiwei Chen, *Government and Academy in Republican China: 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 1927-1949*, Ph. D. Thesis, Committee o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2 例如:刘振宇、维微《中国李庄:抗战流亡学者的人文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岳南《李庄往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3 例如《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从蔡元培说起》与《田野工作,甘苦共之:从董作宾的一则故事说起》二文,都是笔者以过去的研究成果(《蔡元培与史语所》和《丁文江与史语所》,均收入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为基础,是以撰述之史源依据,不一一注出。

4 《张忠栋教授传》一文,简体字版未录。——编注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本书的许多故实陈迹,与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密切相关。因缘所在,实反映个人学术生命的历练和成长。1995年,承杜正胜与王汎森教授的厚爱,笔者有幸进入史语所工作,主要承担协助该所珍藏《傅斯年档案》的整理工作。俟《傅斯年档案》的整理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承黄宽重教授之命,笔者又负责整理王韬手稿《蕲华馆杂录》,迄2001年夏竣事。同年8月,笔者即幸运地转任近代史研究所的专职工作。对于笔者而言,问学求道之路上得以接触《傅斯年档案》与《蕲华馆杂录》这两份珍贵的史料,并参与它们的整理工作,实为罕有之机缘。在史语所工作六年,承乏这两项工作业务,更是厚植治学基础最为扎实的训练过程,较诸少林寺幼稚沙弥之习蹲马步以立昂扬武林之基,不遑多让。经此一役,个人治学之所得,永植长存;对史语所先贤前辈的风谊,亦稍有知稔。细数研究院的整体历史,史语所正与院同寿长青,多少旧事,深富意趣,足可发人深思。笔者既有幸多识与史语所相涉的青史故踪,偶有思虑,即引征旧档故书,敷衍成文,自对史语所前辈行谊与互动往来的历史,勾勒较多,着墨较深。因缘所缔,对于杜正胜、黄宽重与王汎森三位教授的厚爱提携,谨此特别表示谢意。

本书绝大多数篇章的催生园地,是研究院研究人员联合会出版的《山猪窟论坛》。对于共同参与这项事业的林美容、张茂桂、胡台丽、高明达教授等前辈同仁,以及主编《山猪窟论坛》的陈仪深、杨晋龙两位兄长,亦特此深致谢悃。“儒以文乱法”,本书的若干文章刊诸《山猪窟论坛》之后,间或引起不同的看法,必须感谢研究院李远哲前院长与个人直属长官陈永发所长的宽容涵蓄。南京的邵建先生,多番推荐本书若干篇章转发于内地的报刊杂志,其诚可感。蔡登山先生积极鼓励笔者集结这些文字,并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大量的心力,厚情深谊,尤需铭谢。这部小书的问世,如果能够引起读者对于研究院历史的兴味,让公众对于这方清醇的学术天地,是在什么样

的世变大局里得以维存长续,能够略有认识和理解,那将是笔者最大的荣幸了。

潘光哲

2008年3月25日拟写,时正旅居北美麻州剑桥

2009年8月27日定稿

目 录

序 言 / 1

甲 辑

中研院院长和政治:以蔡元培为中心 / 3

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从蔡元培说起 / 9

“独立之精神”:从选举中研院院长的一次故事谈起 / 13

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 / 25

未知世界的冒险和鼓励:从一个学术评鉴的故事说起 / 33

“进军西北”:创立一个研究所的故事 / 39

“中央研究院”的任务:胡适和蒋介石的“抬杠” / 47

再论“中研院”院长和政治:胡适、雷震和蒋介石 / 57

“白色恐怖”阴影下的“中研院”:从费正清说起 / 65

乙 辑

“公”与“私”之间:从丁文江的故事说起 / 71

所长所长:从傅斯年说起 / 75

“胖猫”与“小耗子” / 79

胡适和顾颉刚 / 85

顾颉刚离开北京 / 93

胡适与吴晗 / 103

“战友”:傅斯年和吴晗的一段学术交谊 / 119

自由翱翔的学术天地:从周一良的故事说起 / 127

田野工作,甘苦共之:从董作宾的一则故事说起 / 131

“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从王叔岷的故事说起 / 141

为什么是史语所的“拒绝往来户”:以王世襄为例 / 145

丙 辑

研究院大事简编 / 153

研究院组织法 / 194

研究院研究所组织规程 / 201

研究院研究中心组织规程 / 210

附 录

刘广京先生学述 / 217

征引书目 / 226

甲

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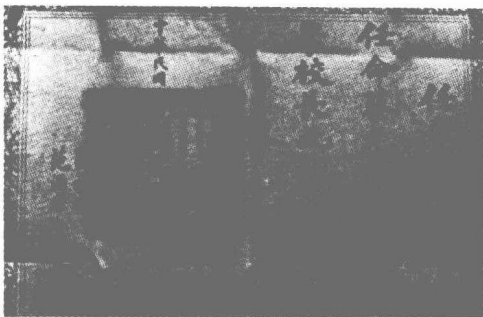
中研院院长和政治：以蔡元培为中心¹

从传统的“士大夫”蜕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向来被视为近现代中国历史变迁的重大面向之一。原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大夫”，已然在现代的历史舞台上消失，现代“知识分子”作为自由流动的社会群体，取而代之。然而，不论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的角色如何转换，不变的是，我们的社会里总是存在着一个拥有“文化资本”的群体，借由他们掌握的文化知识生产技能，既换取个人的生存资源，也为谋求人类群体能够朝着理想进步的方向前进，奋斗不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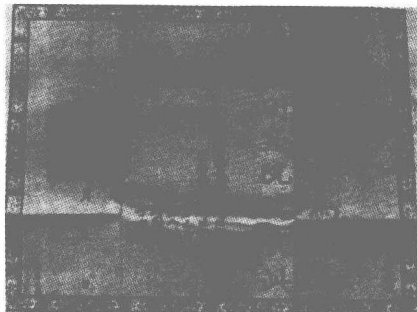
然而，对“士大夫”或“知识分子”而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总是无可奈何的。特别是，面对着掌控国家机器的政治权威的“败政失德”，“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的“理”，往往和现实里的“势”，激烈冲撞；它的结果，也往往必然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必须饱尝对现实处境的无力感（乃至萧肃凄寥与惊恐寒战夹杂并存的苦涩）。自认直道而行却形影踟蹰的“士大夫”或“知识分子”，史不绝书。中央研究院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学术建制（academic establishment），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它的组成分子里，也总是有人遭遇这样的命运，身为中研院创院院长的蔡元培，便是个中着例。

蔡元培的生命道路，首先便是从传统的“士大夫”蜕变为现代“知识分

1 原刊《山猪窟论坛》第8期（2004年2月）。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任命状(1916)



蔡元培就任中研院院长的特任状(1928)

子”的缩影。他是大清帝国的翰林，誉享士林。但是，在革命风潮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分，蔡元培却加入了革命“造反”的行列，他脱下了翰林长衫，卷起袖子，亲自“下海”，进行制作炸弹的实验，那枚炸弹要瞄准的对象，则是大清帝国的权贵。“革命不忘读书”，蔡元培也是中国留学生队伍的成员之一，远扬他乡，羁旅异域，以追求新知为职志，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德意志帝国的高等学府，都留下他的身影，他更是德国著名的史学流派“兰克学派”的大将之一兰普希特(Karl Nathanael Lamprecht)的“德意志文明史”课程的生徒之一。待得革命功成之后的岁月，蔡元培固然戮力于教育学术领域，先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即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中研院院长等职，表率士林；然而，他的“政治热情”，不曾稍减，传统“士大夫”向来关怀国是的行止，屡屡明白可见。当然，在政治立场纷乱不已的现代中国，对于他的政治抉择的批判，也从来不曾停止过。

例如，1923年，曾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卷入政治斗争的风波，无端被控纳贿而遭逮捕入狱，蔡元培就在北京大学校长的任上，对于军阀支配下的北京政府不经法律程序，径行逮捕未经证明有罪的人，气愤不已，即以辞去北大校长一职表示抗议。他在各报刊登启事说：

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这样激烈的反应，让时人深感讶异与不解，更引起批评。比如经蔡元培任命为北大文科学长（即文学学院院长）的陈独秀，当时已离开学界加入革命斗争的行列，担任中共总书记，他就提出批判说，蔡元培企图以辞职打倒恶浊政治的作法是消极的，“只看见学者官吏而看不见民众”，“是民族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碍”，只会引导群众离开奋斗的倾向，而走向退避的路上去。陈独秀的“革命劲头”，让他对曾经“提拔”自己的“老长官”，如此不假辞色。

在1920年代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浪涛里，中共引起了国民党内部不少成员的疑惧，终至双方相互仇讎，以兵戎相见的局面。1927年4月12日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清党”，则是这段血腥历史里的一页。身为“革命元老”之一的蔡元培，则和同辈的吴敬恒等人，基于多重因素，都站在蒋介石的这一边。蔡元培的选择，颇引时议。胡适便为之辩解曰，既然“蒋介石将军……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那么，他领导下的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又曰：“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的同情的。”

可是，究其实际，这个“新政府”绝对不是现代的民主政府，它的作为，和人们的理想期望，有很大的差距。好比说，它以一纸内容模糊的《保障人权命令》，便要遮掩自身迫害人权的罪恶，就让胡适看不下去了，他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直斥其非。这时候已出任中研院院长的蔡元培，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深觉实有“振聩发聋”的作用，不胜佩服。两人既对人权问题都有共鸣，一起参与保障人权的事业，理有必然。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孙中山遗孀宋庆龄与蔡元培担任正、副主席，时任中研院总干



1933年，鲁迅、萧伯纳、蔡元培合影。



蔡元培与中研院总干事杨铨合影

事的杨杏佛(铨)则兼任了同盟的总干事。翌年1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胡适则出任执委会主席,共为推动人权事业而努力(后来,胡适以他故而辞职乃至退出,不赘)。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更无疑象征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一种控诉。特别是,主席宋庆龄与中共接近的左派色彩,更引人注目,联想多矣。中研院的两大要角——院长与总干事非仅名列其间,实际上还是活动的核心分子。因此,当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横死于上海中研院的院门之外,凶手是谁,固然是永远无解的历史谜题,却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国家机器在“理”的层域里既然不能服人,便只能用最赤裸裸的暴力手段来“对付”和它唱“反调”、让它“丢脸出丑”的书生。

蔡元培并没有被杨铨遇害的下场给震慑住,情义所至,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当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一代文豪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后,他不但名列治丧委员会,还亲身送葬。在葬仪上,他更是第一位致词悼念的人。鲁迅早被视为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他告别人间后的种种纪念仪式,也被转化为有利于左翼文化阵线的宣传活动,蔡元培的行为,当然不会讨视既成威权(及其支持者)的“欢喜”。即如胡适的学生苏雪林(时为武汉大学教授)亦大不以为然,便以公开信向蔡元培表示异议,认为他的行动,可能造成“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将为党国大患也”的结果;她还致函胡适,对此事大发议论,并要他思索如何“从左派掌握中夺回新文化”的问题。送死悼亡的人情之常,竟是为政治/文化斗争服务的!

身为国家学术建制的最高领导者,中研院院长一职当然和政治脱离不了关系。然而,蔡元培的一生,历经了从“帝国”到“党国”的变迁,走完了从“士大夫”蜕变为“知识分子”的过程。他的转变,是目睹与认知时代局势之所向的抉择结果。在自己的生命道路上,为了追求自己所设定的理想情境,蔡元培无所畏惧,有所为,亦有所不为。帝国翰林或是北大校长的清高地位,可以弃如敝屣;身为学界士林领袖的中研院院长,他则无惧于政治威权可能的

压制,无畏于他人的批判。蔡元培绝对不是仅仅以这个或那个机构的学术领导者的地位在历史上留下光彩的,而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人物之一为人们追怀不已的。因此,蔡元培的风范,必然可以为无数世代的“知识分子”提供无限的启发意义。